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更要有文化

范玉刚

党的十九大制定了面向新时代的发展蓝图,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在文化建设方面,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数字文化产业契合了消费群体的代际转换,呈现出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个性化等特点。消费方式的变化和差异化的诉求,使文化消费真正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数字文化产业深刻影响了文化的发展生态和生存环境,改变了文化的样态和传播方式,尤其是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在文化产业统计分类中,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密切相关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近两年平均增速为30%左右,是文化产业整体增速的两倍以上,成为领跑文化产业的引擎。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直播网红、微电影等迅速发展,成为目前大众文化消费的主要产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晓明认为:“由于数字技术进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文化内容的创造者从小规模专业作者向大规模业余作者迁移的局面。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接触到任何人类文化成果,消费或是参与生产任何文化产品。”因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文化生产端和消费端都出现了非线性链接,后现代“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愿景成为现实,极大地激发了大众的文化表达意愿和创造活力。

数字文化产业是“互联网+”以及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在本性上是技术思维,而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意和文化价值(包括版权),其在本性上是文化思维,是文化与技术的时代性融合。由此,发展数字文化产业需要“科技+”与“文化+”协同创新,是两者在本性上的相互贴近,它既需要平台的整合与垂直分发能力,更需要文化的集成与价值的提炼与创新,使技术与文化(艺术)保持适度的审美张力,才会有意义的高地与价值的再创造,其成就的是一种新的文化业态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作为一种新兴文化业态的集合与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它在当下的发展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问题。

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相比,我们在关键技术创新和某些核心技术

应用上仍有不小差距,需要借助科技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大国内市场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实现后来居上的技术赶超,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夯实技术基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明积淀是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的优势,但尚未转化为产品和服务优势,亟待实现文化产业发展能力突破。

就现实操作性而言,在葆有审美眼光和文化情怀视野下,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急需探索多元化的商业模式。随着代际性消费群体的成长和移动支付技术的突破,网民已经习惯于自己所喜欢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付费,付费消费成为数字文化产业的主导型盈利模式。但还需要多元且成熟的商业模式创新,才能支撑日渐庞大的市值空间,从而使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同时,随着技术创新及其应用的日新月异,互联网传播渠道日益畅通,优质文化内容的缺失问题愈发显现,与之相应的问题是版权保护及其形象商品化授权问题凸显,这将制约产业链的延伸与拓展。如何兑现和提升轻资产的文化艺术价值,持续性地吸引线上流量和线下趋之若鹜的消费者体验,对企业来讲是极大的考验。

另一方面,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仍要回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尤其是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才是制胜之道,也是数字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就此而言,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中价值观的融入问题凸显,急需文化产业正向价值的强势引领和审美规制。数字文化产业已成为事实上文化消费的主导形态,是当前文化创新的动力之源,是大众文化消费的主流形态,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主阵地,更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依托力量。当前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中,正确的价值导向及其评价体系亟待完善,需要健全包容而理性的社会评判标准,以全社会之力支持数字文化产业做强。在理想条件下,数字文化产业不但自身要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渠道,还担负着孕育和润泽创新文化的重任,更要成为时代文化的引领,成为文化及其价值创新的源泉。

文化及其文化价值的融入是数字文化产业包括数字艺术产业的基础,坚定文化自信是根本。互联网是渠道和平台,“互联网+”实现了无线链接的可能,成为资源和要素流动

与整合的利器。但是,文化是消费的对象和附加值以及利润的来源,是经济价值的来源,是社会价值的载体。现实中诸多数字企业本身就是高科技(网络)公司转型,依托技术优势受到金融资本的青睐,呈现几何级扩张。如果不明白真正的赢利点和消费痛点,往往就会迷失方向,其可持续发展将会大打折扣。不同于资本逐利本性的短期回报,文化需要累积和长期积淀,需要情怀和眼光,在润物细无声中形成企业的文化特色。过度追求抢眼球和制造噱头,只是技术造势和信息的无序,带来的是技术的狂欢和资本的狂舞,而不是文化的使命担当。因此,数字文化产业的健康理性发展,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支持。要建立健全国家文化运行体制,发挥政府监管和引导职责,充分发挥市场功能,更要补足社会短板的支撑力量。一定意义上,社会力量所能托举的高度,将决定数字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互联网思维,更要有文化思维,要有文化价值引领。只有成为文化创新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主导方式,数字文化产业才能够发展、壮大为真正的产业门类,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生力军。一些数字企业及产业集团,其产业扩张和市值的快速提升多基于互联网特性。一定意义上,它们抓住了时代的特征(互联网时代),而没有抓住时代的本质(文化创造时代),缺乏“文化+”的融合渗透。这样的企业能走多远,能否形成真正的朝阳产业,能否支撑起庞大的市值,取决于其魅力所在。但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每年的爆款产品只有几部,其风险把控极难操作,具备IP开发能力不是一个客观的溢价标准,最终取决于收益,更受制于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因此,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只有那些具备较高文化价值的引领者,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胜出。

散文的题材是十分宽泛的,有“文种之父”的说法。这中间,写亲情、乡情和友情的,要占相当的比重。特别是初学习作者,往往就从这里起步。但是经年有日,一些逐渐摆笔成熟的散文“写家”,也会发现自己竟然重复起自己来,跳不出“熟悉”的圈子。难道还鼓动散文作者专门揪出根脉去展现“陌生”的猎奇事端么?当然不是。但不妨应时代的呼唤,扩大眼界与思路,凝眸于自然大地,异域风物,尽吮整个“地球村”的宝贵滋养,成为世界大家庭建设的一员。

在现今散文写作领域,自打“五四”新文学肇始,域外情景便不缺文笔表现,有通过“旅行记”类作品开阔民智的视野,介绍世界的状况,为民族的解放与进步,提供真实可靠的参考。为人熟知的有周恩来的《旅欧通讯》和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郭沫若的《今津游记》、冰心的《寄小读者》及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郁程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以上还仅是国门初启时的粗浅记录,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曾遭多国封锁;进入新时期,特别是新时代,这类散文方得以再兴,门类得以复兴。由作家尧山壁80篇域外散文结成的《趣味欧洲》,25万字的篇幅,有过去积攒下的,也有近年新作。从中欧“开花”,经南欧到北欧,东欧到西欧,八九个代表性的国家被说个“底儿掉”。书名带有“趣味”二字,却让人无法寻觅到“逗闷子”和“找乐子”的低俗景象,而尽情表述的是高尚的雅致兴味。

作者到法国巴黎,写了“华夏之风吹拂香榭丽舍”“地广林深幽表枫丹白露”,还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拉斐尔神父公墓,甚至出现“现象级”神品,这是其魅力所在。但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每年的爆款产品只有几部,其风险把控极难操作,具备IP开发能力不是一个客观的溢价标准,最终取决于收益,更受制于产业生态和市场环境。因此,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只有那些具备较高文化价值的引领者,才能在大浪淘沙中胜出。

支燃烧的小火炬,900支象征征着困顿的900天。民族保卫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集体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足以惊天动地、泣鬼神。

挥笔外域散文写作,常遇人物与人物的碰撞,美景与灵魂的纠葛。《趣味欧洲》特别关注那里的伟大人物和不屈魂魄。如果像一些人那样,只是流连于车窗之外的“西洋景”,此行岂不于浮泛粗浅了?书中以不算轻松之笔直接记访了德国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瑞典诺贝尔故居白桦山庄、“1848年革命最后的英雄”匈牙利裴多菲的故居凯希格达西……但是更多的篇章奉献给了文学艺术家,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乔治·桑,意大利的但丁、达·芬奇等;德国的歌德、席勒;英国的莎士比亚、济慈、肖伯纳、狄更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比利时的凡·高;丹麦的安徒生;捷克的卡夫卡,特别是全书后部几章又写给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谢普琴科……不仅历数了名人大家,而且直奔他们的情感世界。通篇人物活灵活现,如师似友,情谊绵绵。当中的一篇散文中记述卫国战争中苏联共有800名作家上了前线,250多名牺牲在战场。刘白羽听闻后说:“在那反法西斯的年代啊,我们虽然相隔万里,但我们的战壕却紧紧相连。”尧山壁也是烈士之子,他写道:“那次笑笑钻进我的胸膛,那泪水一直流进我的血液里。”还有什么样的游记散文能够令人如此动容呢?

用心琢磨起来,《趣味欧洲》的情趣与味道,还表现在作品朴实而曼妙的细节描绘上。如果在跨出国门来往行程途中,只是对域外略述大概,毫无见地和个人“发现”,那么抚摸地球仪和翻阅说明书也就差不多了。然而写到巴黎除了豪华的文艺殿堂之外,还留意了形形色色的街头艺术:数以百计的画摊在蒙马特小广场上排列成行,阵阵悠扬的琴声在广场和地铁里传出远播;再加上服饰和香水拥身的巴黎女子,那真是百般悠闲,风情万种。还有醉洒慕尼黑、泛舟威尼斯,呻吟多瑙河、夕阳斜塔影,一幅幅欧罗巴景致完整地呈现在游客面前。有巨幅写意,也有小品工笔。“大石头离开小石头砌不成墙”,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完美就是如此打造而成的。

在《趣味欧洲》散文集问世的同时,“黛西欧”国际班列于2019年7月首发,汽笛长鸣,铁流滚滚。河北乃至华北、西北有了常态化通往欧洲的陆路通道。它代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深走实,行稳致远,成为和平之路、创新之路、绿色之路和文明之路,又有谁不去赞诗游记散文放笔去,所搭起的彩虹大陆桥肩负的历史重责呢?

在《趣味欧洲》散文集问世的同时,“黛西欧”国际班列于2019年7月首发,汽笛长鸣,铁流滚滚。河北乃至华北、西北有了常态化通往欧洲的陆路通道。它代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深走实,行稳致远,成为和平之路、创新之路、绿色之路和文明之路,又有谁不去赞诗游记散文放笔去,所搭起的彩虹大陆桥肩负的历史重责呢?

——赵晓翠《红旗文稿》微信公众号

历史剧创作要树立正确历史观

历史剧是由历史和戏剧两个不同门类组成的综合形制,是跨学科、跨文体的叙述方式。在历史剧中,史实是一种界限,是对戏剧质感的约定;虚构是一种空间,是对戏剧美感的装饰。同时也要看到,史实与虚构既有拥抱的条件,又有吵闹的基因;既有携手的园地,又有分开的路口。而历史“拉郎配”把两者送入“洞房”,乃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存在与想象的结合,是严谨与灵动的结合,是古代与现代的结合,是对立与统一的结合。或者不妨把历史与戏剧视为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历史比较严肃,很少有求戏剧这位激情四射的朋友来宣传自己的意志;戏剧则比较张狂,倒是每每要借历史这位谨言慎行的朋友来表达自我的思想。既然是“借”人家的东西,就要十分珍惜,精心使用,弄坏了不好归还,因为朋友相处,要讲究信用。如果去掉比喻,正儿八经地谈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历史剧的创作要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同时也要给予历史剧充分的创作自由,肯定其诗意思想,合理虚构。但目前的问题不是历史限制和束缚了虚构,而是虚构往往歪曲和伤害了历史,因此,历史剧创作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保护历史安全。

——薛若琳《中国戏剧》2019年第7期

观点摘编

和谐社会构建需要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浸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及典型特征无一不始终贯穿着“和”字,并将“天人合一”“尚中贵和”视为最高的价值准则。“天人合一”包括人与天地自然的共生共存,人与社会的“修齐治平”,人与人的“守望相助”以及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等,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价值基础和社会认同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加强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新时代,更要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涵养个人品德,塑造人格的心理防线,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理想信念的追求与深沉理性的忧患意识结合在一起,继续守望生命内在的价值,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赵晓翠《红旗文稿》微信公众号

历史剧创作要树立正确历史观

历史剧是由历史和戏剧两个不同门类组成的综合形制,是跨学科、跨文体的叙述方式。在历史剧中,史实是一种界限,是对戏剧质感的约定;虚构是一种空间,是对戏剧美感的装饰。同时也要看到,史实与虚构既有拥抱的条件,又有吵闹的基因;既有携手的园地,又有分开的路口。而历史“拉郎配”把两者送入“洞房”,乃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存在与想象的结合,是严谨与灵动的结合,是古代与现代的结合,是对立与统一的结合。或者不妨把历史与戏剧视为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历史比较严肃,很少有求戏剧这位激情四射的朋友来宣传自己的意志;戏剧则比较张狂,倒是每每要借历史这位谨言慎行的朋友来表达自我的思想。既然是“借”人家的东西,就要十分珍惜,精心使用,弄坏了不好归还,因为朋友相处,要讲究信用。如果去掉比喻,正儿八经地谈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历史剧的创作要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同时也要给予历史剧充分的创作自由,肯定其诗意思想,合理虚构。但目前的问题不是历史限制和束缚了虚构,而是虚构往往歪曲和伤害了历史,因此,历史剧创作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保护历史安全。

——薛若琳《中国戏剧》2019年第7期

艺海观潮

弄潮五线间

听《钱塘江交响》音乐会

卜大炜



《钱塘江交响》音乐会上,小提琴家周瑾演奏《乡愁》。

音乐分文场和武场,以往我们在音乐会上听到的总是武场,噪音震耳欲聋。打击乐的滥用是一种虚张声势,这台音乐会是我听到的打击乐用得最合度的一场。在叶小纲的交响素描《美丽乡村》中,民歌已不是小调儿的格局,而有了雅集音乐、文人音乐那天马行空的境界。乐曲开始用长笛、黑管来营造笛、箫的意境。古朴的音乐素材被赋予新技法,听来清新流畅,形成水彩画的绚丽多姿,富于空间感,历史与当代在时空中对流。指挥家邵恩近年来投身创作,上次是《哈尼交响》,这次以钢琴协奏曲《钱塘随笔》(吴纯独奏)再次惊艳。第一乐章独出心裁,以钢琴独白开始,第二乐章诙谐的动机,在中国的交响作品中难能可贵。而二乐章和三乐章中段各有一段优美的抒情,如梦如幻。第三乐章钢琴与乐队时而对峙,时而对抗,严谨而引人入胜,全曲层次丰富,格调高雅,充满五声调式的民族风情。

杨帆的为大提琴、打击乐与乐队而作的《白马》,由大提琴(许玉莲)和中国鼓及手锣(王佳男)主奏。大提琴与中国鼓两个主角在这里成为对手戏,分明是一场“霸王别姬”。音块手法用在一个经过句上,画龙点睛,点到为止。王喆的交响随想曲《印》,音乐以金石篆刻刀锋的万钧斧凿态势,借喻钱塘江海潮。汉字的造字手法有形声与会意,如果其他作品以形声来描绘钱塘江,那么《印》以西泠印社的篆刻来会意大江大河的浩浩汤汤,创作角度独到,一气呵成。黄凯然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的《乡愁》(周瑾小提琴独奏),独奏中华彩部分那精致优美的对位技法,深得巴赫的神韵,令人回

味。配器中以黑管来指代箫和埙的音响,也很有特色。李劲晟的为男高音、女高音与乐队而作的《之江梦》(薛皓垠、宋元明独唱,叶静桐作词),音乐采用中国古代诗词吟唱的风格,如辛弃疾词般的豪放,同时也具有瓦格纳声乐写作的交响冲击力。这部作品也为音乐会扣了题:“集合中国传统文人音乐、民间音乐、西方当代音乐等材料,融会贯通形成能够为世界共同理解并接受的新的音乐风格”,也是整套音乐会的作品所表达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当代英雄主义气概和流向未来的浪漫情怀”。

音乐会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纯管弦乐队配置,但民族器乐的手法与特色都有机自然地融合在技术手段中,民族音乐没有作为一种标贴式的符号,西洋技法与民族音乐不再是两张皮,而是相互映衬和催化。这让我们看到,中国交响乐创作已从对西方20世纪技法的单纯猎奇模仿中走出来,技法已经熟练地为我所用,民族音乐内涵自然而然地通过先进的技法表达,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产生了美好的形式。民族音乐为管弦乐技法提供了表现空间,管弦乐技法为民族音乐增添了魅力。音乐会上所有的作品在调式调性上都有扩张,尤其是其中四位青年作曲家的作品,注重音程的现代化纵向叠置方式来强化音响的张力,但都以民族的调式占据核心地位统领音乐。作曲家们运用传统技法娴熟,运用新技法、不协和手法有分寸,做到不为传统所困,不为技法所累,中西音乐不仅各美其美,更是美美与共,打造出一组优美的交响乐作品。

由浙江省钱塘江文化节组委会委约创作的《钱塘江交响》音乐会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首演,由邵恩指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七位作曲家将“壮观天下”的钱塘江大潮及流域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淬炼出七部激荡的交响乐作品,托物咏志,弘扬了浩然的民族气概,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些作品将民族音乐的内涵与传统与现代作曲技法融合,将民族音乐素材加以现代技法的艺术夸张和变形,结构与细节方面都深具匠心,从而产生风格鲜明而优美生动的音乐语言,体现了中国交响乐的美学定位。

关峡的交响音画《钱塘潮》运用了磅礴的越剧曲调,但不以戏曲原面目出现,而是提升到“戏曲咏叹调”化的时代风情、风格层面出现。作品注重曲式的动力性发展,从铝板琴上一个音符抽象地开始,经由各个声部水墨画般的流畅线条戏剧性地积淀发展,达到大潮到来时终极思考的喷涌而出。潮涌的到来主要以大号和大鼓来描绘,打击乐用得很有节。钱塘江大潮正是以势震撼,而不是以声夺人。戏曲